



「美」阿瑟·高顿 著

一个艺妓的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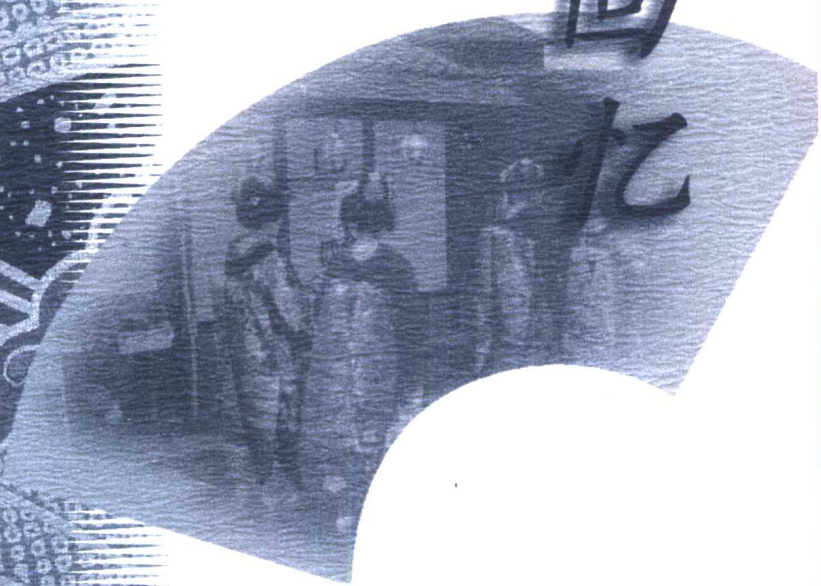
Memoirs of a geisha

●《一个艺妓的回忆》高居美国《纽约时报书评》小说类畅销榜2周之久。
●荣登英国《书商》杂志、德国《明镜》周刊、澳大利亚《图书新闻周刊》、印度《印度图书评论》等国畅销书排行榜。
●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将执导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

一个艺妓的回忆

Memoirs of a geisha

[美] 阿瑟·高顿 著 黎明 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MEMOIRS OF A GEISHA

Copyright ©1997 by Arthur Golden.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艺妓的回忆/(美)高顿著;黎明译. —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 2

ISBN 7-225-01691-1

I. 一… II. ①高…②黎… III. 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4147 号

一个艺妓的回忆

(美)阿瑟·高顿 著 黎明 译

出 版 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包销
印 刷: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15
字 数:	34 万
版 次: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5-01691-1/I·383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作者的话

193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当时我还只是一个14岁的男孩,父亲带我去东京一家戏院看舞剧表演。至今还有记忆的,只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观众中只有他和我两个人是西方人;我们从荷兰老家来到东京还只有几个星期,所以我还没有调整好两种不同文化间的距离,对于刺耳的音乐很不习惯。第二件事是在我奋力学习日语数月后,高兴地发现我竟可以理解舞剧中的某些对话了。一些年轻的日本女人在台上舞蹈时,除了色彩鲜艳的和服还留给我一些模糊印象外,别的什么都不记得了。我怎么也想不到,远在纽约市,远隔几近50年后,其中的一位竟会成了我的朋友,并向我口述她离奇的回忆录。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常常把各种回忆录看作是历史的素材。但是,一份回忆录所提供的记录不如回忆录作者所看到的多。回忆录和传记不同,传记作者可以有他自己的视角,而回忆录作者却不能有自己的视角。人物自传,如果确实是真实历史的话,就像我们询问一头兔子,让它告诉我们,它在田野草丛里跳来跳去的时候是怎么想的。这些想法从何而来?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想听听有关田野的事,没有人有较好的条件来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明白,我们所思念的田野,一头兔子是无暇去观察的。

我这样说,还因为有一位颇有声誉的学者也这么说过。然而,我应当承认,我的朋友仁田·小百合的回忆录却迫使我重新

考虑这种观点。是的，她向我们隐瞒了最秘密的一部分生活——兔子眼中的田野，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但是，再也没有一位艺妓能像小百合那样提供这样一份奇异的生活记录了。她所留下来的这份记录，远比《日本的璀璨珍宝》一书在有关她的一篇长篇报道以及这些年来多种杂志有关她的文章所讲的更完整得多、更准确得多，也更动人得多。看来，在这样一个不寻常的题目上，没有人能完全了解回忆录的作者，甚至回忆录作者本人也不能完全了解。

小百合享有这么大的名气，大都是靠了机会。别的一些女人也过着和她同样的生活。著名的艺妓加藤·由希（她深获 J·皮尔庞特·摩根* 的侄子乔治·摩根的心，在本世纪头十年中成为他的“被放逐的新娘”）也许在某些方面比小百合的生活更加不同凡响。但是，只有小百合把自己的家世如此完整地记述下来。很长一个时期，我认为她这样做，是一种偶然机会。如果她仍留在日本，她的生活会堆积得太满以至难以整理出一份回忆录。幸而在 1956 年，环境使她移民到美国。她在美国居住 40 年，成为纽约市沃尔多夫大厦的住户，在 32 层布置了一套华丽的日式房间。她在此仍过着目迷五色的生活，套房里的常客有日本的艺术家人士、文化界人士、商界人士——甚至内阁大臣或一两个黑道人物。1985 年经一位朋友介绍我才认识她。作为一个研究日本的学者，我听说过小百合的名字，虽然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们逐渐熟悉，成了朋友，她向我透露心声越来越多。一天，我问她是否愿意把她的故事公诸于众。

“好啊，雅各布先生，可以，只要是你来记录。”她回答我。

* 皮尔庞特·摩根曾在纽约市建立一座私人图书馆纪念其父，1924 年起向公众开放。馆内藏书甚丰，尤以收藏名家手稿著名于世。——译注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合作。小百合明确说她情愿口述而不是亲笔来写她的回忆录,因为,据她解释说,她最习惯于面对面地谈话,如果屋子里没有听讲的人她就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我同意她的意见,工作共费时 18 个月。我对小百合的东京方言倒不在乎,担心的是如何把语言所表达的细微区别准确地移译过来。不过从一开头我就发现自己已经被迷在她的世界里了。除了极少例外,我们几乎都是在晚间见面,因为她在这种时候脑子最活跃,这已成为她多年的习惯。通常她愿意在沃尔多夫大厦的套房内工作,但不时地,我们也常去公园大街一家日本餐馆的雅间,她是这家餐馆的熟客。谈话一般进行两三个小时。尽管每次谈话都作了录音,但她的女秘书总是在场用打字机打下她的口述内容,非常认真。不过,小百合从不对着录音机或秘书讲,她总是对着我讲。她忘记讲到什么地方了,总是我来提醒她。我感到我是这件事情的基石,如果不是我获得了她的信任,她决不会把自己的一生讲出来的。今天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看法:小百合选择我做她的听写员,也许是她已等待很久,等待这名合适的候选人自己跑过来。

有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小百合想讲出她自己的故事?艺妓也许没有作过永保缄默的正式誓言,但在独特的日本文化中,人们深以为:上午在办公室做些什么事,晚上关起门来做些什么事,都与他人无关,相互之间都不要去过问,决不能乱打听。艺妓从来不谈自己有关的经历。就像比她们社会地位低的妓女一样,艺妓也是处在一种不正常的位置上了解这位或那位社会人士是否也同别人一样,穿裤子的时候,是一次伸一条腿还是两只脚同时伸进裤腿里去的。也许她们的信誉使这些祖国的花蝴蝶保持了公众的信任,而在任何情况下,艺妓如果破坏了信誉,也将使自己处于难以立足的地位。小百合肯讲出她的故事来,是

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但任何日本人士对她已无能为力了。她同故国的联系业已割断。也许这点能告诉我们(至少部分说明)她认为已不受必须再陷于沉默的限制,但仍未说明她为什么作此选择。我不敢向她提出这个问题,要是她踌躇起来改变主意怎么办?甚至在手稿写成后,我都不大情愿向她提这个问题。直到她从出版公司收到预付的稿酬之后,我才敢问她:你为什么想把自己的一生记录下来?

“这些日子不做这件事还有什么事可做呢?”这就是她的回答。

至于她的动机是不是就那么简单,我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吧。

虽然小百合渴望把她的传记记录下来,但她坚持几个条件。她只想等她自己以及她一生中明显涉及到的几位男子死后再出版此书。结果恰好是这几位男子都先她死去。小百合非常关心不要因为出版此书使人难堪。书中人物的姓名,只要有可能,我仍用他们的原名并未变动,尽管小百合在口述期间已经将一些人的真实姓名隐去,换成了假姓名,这在艺妓中间,提及她们的顾客时已习惯如此。书中遇到像“雪花先生”那样的人物(这个绰号暗示此人有太多的头皮屑),如果读者认为小百合只是为了寻开心,就有可能误解她的真正意图。

我在请求小百合允许我用录音机的时候,我的用意只是怕她的秘书的打字很有可能出错。在小百合去年去世后,我怀疑自己早先是否还有另一个动机——就是说,想保存她的声音——这是一种我很少遇到过的富于表情的声音。她习惯于柔声细气地讲话,就是那种以伺候男人为职业的女人的说话声气。但是,当她想把一个场面活生生地讲给我听的时候,她的声音使我以为屋里足有六个或八个人在场。至今,我有时晚间还在书房里放她的录音,我觉得真难以相信她已不在人间。

纽约大学日本历史研究阿诺德·拉索夫讲座教授

雅各布·哈尔休伊

第1章

设想一下：在一间可以俯瞰花园的安静房间里，你我俩人边啜着清香的绿茶，边谈着某件早已逝去的往事，我对你说：“我遇见某某人的那个下午，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个下午，也是最糟糕的一个下午。”我想你也许会放下茶杯，说：“等等，怎么回事？究竟是最好还是最糟？不可能既是最好又是最糟。”我本来也该嘲笑自己糊涂，同意你的意见的。但事实是，我遇见田中一郎先生的那天下午，确实是我一生中最好又最糟的一个下午。他使我太着迷了，甚至他手上的鱼腥味也好像是某种香水味。如果我不认识他，我肯定不会当上一名艺妓。

我不是由东京人培养成的艺妓。我甚至不是在东京出生的。我出生在日本海海边一个名叫养老町小镇一个渔夫家里。我一生中几乎从不讲起养老町的人和事，也不讲我家的住房，不讲母亲、父亲、姐姐，当然更不讲我是怎样成为一名艺妓的，或者就像是一名艺妓的。许多人总是在猜想我的母亲和祖母都是艺

妓,以及我从断奶开始就接受艺妓训练,如此等等。而实际上,多年前的一天,我给一个男人倒一杯米酒,他偶尔提到,几周前,他到过养老町,啊,我就像是一只飞越海洋的小鸟忽然遇上了老巢来的亲人了。我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说:

“养老町!那就是我的故乡!”

这个可怜的男人!他的脸色明显地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他想尽力装出一个笑容但未能笑出来,他无法掩藏吃惊的神色。

“养老町?”他说,“你是说这个地方吗?”

长期以来我已经练出一种习惯性的微笑,我把它叫做“摊的微笑”,因为它就像是摊戏的面具,表情是僵硬的。它的好处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它的意义;你可以想象,我有多少时候会用上它。当时,我认为最好用这样的微笑,果然很成功。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一饮而尽我替他斟的米酒,然后便哈哈大笑起来,我确信是大为放心的结果而不是别的原因。

“这种联想!”他再次哈哈大笑。“你,是在像垃圾堆的养老町长大的。那就像是在水桶里煮茶!”他边笑着对我说:“你真会寻开心,小百合小姐。有些时候你几乎使我相信你的小小的玩笑是真的呢。”

我不喜欢想到自己是水桶里煮的茶,但我觉得从有些方面来说也就像是这么回事。毕竟,我是在养老町长大的,谁也不会说那是个秀丽的地方。几乎从来没有人去那里旅游过。至于当地的人,也从来没有机会走出去。你会奇怪我怎么会出来的。我的故事正要从这里讲起。

* * *

在养老町这个小渔村,我住在一座我称之为“醉醺醺的房子”里。房子靠近一个峭岩,海上来的大风吹个不停。我还是个孩童的时候,总以为大海得了很厉害的伤风,因为它总在呼哧呼

哧地喘气，打个大喷嚏就喷出一大批海蚌出来。我总觉得我们的房子经不住海风这么时不时地直吹，所以才往后倾斜，想把风躲开。要不是我父亲从破船上拆下一根大木头撑住屋檐，那座房子早塌下来了。可是这么一来，房子就像是一个喝醉酒的老头倚靠在一根拐杖上。

在这座恍恍惚惚的房子里，我的生活也有点一边倒。从幼年起，我就很像我的母亲，一点也不像我父亲和我姐姐。母亲说，这是因为我们两个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真的，她和我两个人都有同样的特别的眼睛，你在日本是几乎见不到的。和一般人的深棕色眼珠不同，我母亲的眼珠是透明的灰色的，我的眼睛也完全一样。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对我母亲说，我猜想一定是有人在她眼珠上戳了个洞，里面的墨水都流出来了，母亲觉得很好笑。算命先生说她的眼珠的颜色这么淡，是因为她身上水太多，其他四个要素*几乎不占份量。而据解释说，这就造成她的模样这么可怜。村里人常说，她应当是非常漂亮的，因为她的双亲正是如此。一只桃子味道鲜美，一只蘑菇也可能很鲜美，可是你不能把这两样东西合到一起；这是大自然向她开的一个可怕的玩笑。她继承了她母亲的大嘴唇、她父亲的尖下巴，给人的印象是一幅精巧的图画可是配了个笨重的大镜框。她的一对可爱的灰眼睛，四周有密密的眼睫毛，准是遗传他父亲的，可是长在她脸上，看起来有点吓人。

我母亲常说，她之所以嫁给我父亲，是因为她命中多水而我父亲命中多木。了解我父亲的人都说我母亲看得准。水从这一处很快流到另一处，总会找到一个裂缝钻进去。而树木则是牢牢地扎在大地上的。从我父亲这头说，这是件好事，因为他是个

* 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同中国一样。 ——译注

渔夫，命中多木的人在海上是比较安全的。事实上，我父亲在海上比在什么别的地方都放心，他从不远离大海。即使他洗了澡，浑身也是一股海水味。他要是不出海，就坐在光线黯淡的前屋地上补渔网。如果这张渔网是一个正在熟睡的生物，像他那样的干活速度，渔网永远不会惊醒过来。他干什么事情都是这么慢慢腾腾。他要是目光专注地朝一样东西望着，你就是跑出去，倒掉鱼缸里的水，再跑进来，他的神态还没有变。他的脸上满是皱纹，每条皱纹里都塞着忧虑或其他东西，以至变得不是他以前的脸了，倒像是一棵树，树枝上满是鸟窠。他曾经努力去弄平这些皱纹，但毫无所获。

我六七岁的时候，知道了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的有关我父亲的事情。一天我问他：“爹爹，你怎么这么老？”他绞起了他的眉毛，看起来就像是眼睛上有两把稍稍折起来的伞。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我转向母亲，她给了我一个眼色，意思是回头再跟我说。第二天，母亲一句话也不说，领着我向山下走去，转过一个弯，来到林中的一块坟地。她把我领到坟场角上的三座坟前，坟前的白色标柱比我的身子还高得多。标柱上从上到下都写着一些看起来很庄严的黑字。我在村里读小学还没多久，还不懂一个字在哪里结束，另一个字从哪里开头。母亲指点着对我说：“奈津子，坂本稔之妻。”坂本稔就是我父亲的姓名。“享年二十四岁，明治十九年”。她又指着另一个标柱：“仁一，坂本稔之子，享年六岁，明治十九年”。挨着的另一块，身份相同，名字是正男，年龄只有三岁。过了一会我才明白我父亲老早以前结过婚，可是全家人都死了。没有隔多久日子，我再次去到坟场，站在那里，感到了无限悲痛。顷刻之间，我的身体往下沉了两下，似乎坟里的人把我往下拽。

有了这些水、这些木，这两个人本该有一个很好的平衡，生下的孩子五行俱全，我想，准让他们大为惊异的是，一人只得一个就结束了，不单单是我像我母亲，也继承了她与众不同的一双眼睛；我姐姐夏子再像我父亲不过了。夏子长我六岁，自然她比我大，她能做的事我做不了。可是，夏子有一个特点，她做什么事好像都没有定规。譬如说，你请她从炉子上的锅里倒一碗汤给你，她可以做好这件事，但是看起来好像她是侥幸做成的。一次，她甚至被一条鱼割伤了。我不是指被她剖鱼的刀割伤的。她用纸包着一条鱼从村里出去爬上小山，鱼从纸包里滑出来碰在她腿上，鱼鳍把她的腿割伤了。

父母亲也许除了夏子和我以外还有过别的孩子，尤其是父亲希望有个男孩同他一起去捕鱼。但是我七岁的时候，我母亲病得很厉害，可能是患了骨癌，尽管当时我还不不懂。她想躲开病痛的唯一办法就是睡觉，她就开始像一只猫那样——就是说，多多少少是在不断地睡觉。数月过去，她白天里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不久便是一醒来就要呻吟。我知道她身体内部什么地方变化得很快，但她命中有这么多的水，我觉得不碍事的。有几个月她瘦下去了，可是很快又壮起来。到我九岁的时候，她脸上的颧骨凸出来了，此后再也没有胖起来。我没有认识到，因为病，她命中的水也干掉了。你看就像海草，本来是湿润的，干了就成了硬须了。我母亲的精气神越来越少了。

于是，一天下午我正在黑黝黝又坑坑洼洼的前屋地上坐着，唱歌给上午抓到的一只蟋蟀听，听见有人敲门：

“噢！开门！我是三浦医生。”

三浦医生每周一次来到我们渔村，自从母亲得病后，他必定要上山来给母亲看病。那天要来暴风雨，我父亲在家未出海。他在地上的老地方坐着，一双像蜘蛛脚的大手缠在渔网上。他迟疑了一下，望着我，伸出一根手指示意我去开门。

三浦医生是位大人物，——至少在我们村子里都这么看。他在东京上的学，据说他认识的汉字比谁都多。他太神气了，看都不看我一眼。我给他打开门，他就脱了鞋，从我身旁过去，进了屋子。

“啊，坂本君，”医生对我父亲打招呼，“我真愿意过你这样的生活，成天到海上去打鱼，多美啊！天气不好呢，还可以在家歇一歇。我看你妻子睡着了，”他接着说：“真可惜，我原以为可以给她瞧瞧病呐。”

“啊？”我父亲说。

“你知道，下个星期我不来了。也许你去把她叫醒？”

我父亲费了点劲才把双手从渔网中脱出来，可是还站着。

“小千代”，他朝我说，“给医生倒杯茶来。”

我那时的名字是千代。几年后当了艺妓，我才叫小百合。

父亲同医生走进另一间屋子，我母亲在那儿躺着。我在门口想听听，只听见母亲在呻吟，听不见他们在说些什么。我赶紧去倒茶，医生很快走了出来，搓着双手，神色凝重。我父亲也跟着他出来，俩人坐到了屋子中央的桌子旁。

“现在该跟你讲点事了，坂本君，”三浦医生说，“你该去找村里一个女人，也许杉井夫人，请她为你妻子做一件新袍子。”

“我没有钱，医生。”我父亲说。

“最近我们大家都更穷了。我明白你说的。不过你不能亏待你妻子。她不能穿那么破的衣裳死去。”

“那么，她快要死了吗？”

“也许还有几个星期。她痛得厉害。死了倒让她解脱了。”

这之后，我没有再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因为我耳朵里听到的是一只小鸟在拼命扑着翅膀的声音。也许是我自己心跳的声音，我不知道。要是你见过一只小鸟陷进一间空廓的庙堂里，想找个出路飞出来，那就是我当时的心情。我从未想到过，要是母亲不病，日子会怎么样。我不想说，我没有想到过，要是她死了，会有什么事。同样，我也想到过要是发生一次地震，我们的房子也许就被大地吞没了。发生了那样的事，我们都活不成了。

“我本以为我先死的。”我父亲这么说。

“你是位老人了，坂本君。不过你身体硬朗。你也许还会活四、五年。我给你妻子再留下些药片。需要的时候，一次让她服两片。”

他们又讲了一会药片的事，然后三浦医生就走了。我父亲还默默地坐了好长时间，背对着我。他没有穿衬衣，皮肤已很松弛的后背裸露着，我越看着他，越觉得他像是一些戏装和织物的混成物。他的脊椎骨的骨结一个个地突出了起来。他的脑袋，污迹斑斑，也许像伤痕累累的果子。他的双臂，只剩下皮包骨头，从两个肿块荡下来。要是我母亲死了，我怎么能同他住在一起呢？我不想离开他，不过，不管他在还是不在，我母亲一不在，这座房子就空了。

最后，父亲低声唤我名字，我走过去，跪在他身旁。

“有件事很要紧。”他说。

他的脸色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沉，一双眼珠转动着，似乎他已快要控制不住它们了。我以为他要告诉我，我母亲快要死了，可是他只是说：

“到村里去。带点香回来。”

我们供佛的小香案，在厨房门口一只破旧的柳条箱旁边，那

是这座摇摇晃晃的房子里边唯一最贵重的东西，在一尊刻得很粗糙的西方极乐世界阿米达佛的前面，立着一些我家祖先的黑色木牌位。

“还有别的什么事情吗？爸爸。”

我希望他再说些什么，可是他只做了个手势，示意我走吧。

* * *

从我们家到村里去的小路，是要从海边峭岩上绕过去的，像今天这样的日子可真难走，不过我倒还感谢大风把我脑子里烦心的事也吹跑了。大海正在狂暴着，大浪锋利得能把石头劈成碎片。似乎眼前这世界和我有同样的感觉。生活会不会顷刻间就被一场暴风雨刮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片荒芜？在此之前，我从未想到这点。我像逃跑似地跑下山去，直到看见了村子。

养老町是一个小镇，就在小河的入海口。通常，水面上这儿那儿都是渔夫，可是今天我只是见几只渔船回来，我瞧着它们，老有这样的感觉，觉得它们就像是几只虫子在水面上挣扎着。暴风雨就要按步就班地来了，我已听到了吼声。入海口的渔夫们一消失在雨幕之中便开始形影模糊起来，随后，完全看不见了。我已经能见到暴风雨正冲着我爬上来。开头的雨点砸在我身上就像鹌鹑蛋，不几分钟，我已经浑身湿透就像是掉进了海里爬上来的。

养老町只有一条街，引向“日本沿海水产公司”的大门，公司有一排房子，这些房子的前门都用来开店。我穿过街，朝冈田家的店铺跑去，那是卖干货的；但就在这时，有件事发生了——一件小事可是后果重大，就像失脚跌到了一列火车前面。下雨后小路泥泞不堪，我的两只脚滑开了，我身子朝前摔了下去，一边脸擦着地。我猜我一定是晕过去了，因为我只记得身子麻木，嘴里有什么东西要想要吐出来。我听见一些人的说话声，觉得脸

朝上被人搭起来了。我想准是把我抬进了“日本沿海水产公司”，因为我闻到周围都是鱼腥味。我听到“帕达”一声，像是他们把一筐鱼从木桌上推了下去，把我搁在了桌板上。我知道自己已浑身湿透，还流着血，一双脚光着，很脏。我穿着一身农民服装，我所不知道的是，从这一刻起，什么事情都变了。正是在这样环境下，我见到了田中一郎先生的面孔。

我在村里见过田中先生多次。他住在附近一个大得多的镇上，每天来我们村，因为“日本沿海水产公司”是他们家开的。他不像渔夫穿一身农民服装，而是穿一套男子和服与和服裤子，在我眼里，就像你也许见到过的古代武士的耀眼服饰。他的皮肤绷紧像一面鼓；他的颧骨略略突起并且发亮，就像是烤鱼的松脆鱼皮。我总觉得这个人很好玩。我同别的孩子在街上玩扔豆包的时候，田中先生有时正好从公司踱出来，我常常停下来看看他。

我躺在那张滑兮兮的桌上，田中先生在检查我的嘴唇，用手指拉拉，又敲敲我的脑袋，做做这个做做那个。他忽然注意到我的灰眼睛，满脸喜悦。我也望着他，他没有嘲笑我，譬如说我是个冒失姑娘；他也没有把目光转过去，不理睬我在望着什么、想着什么。我们俩人彼此凝望着好一阵子——直到我忽然觉得浑身发冷，尽管这里是空气闷热的水产公司。

“我认识她，”他终于说话了。“她是坂本老人的小女儿。”

即使作为一个孩子，我也明白田中先生看待周围事物是真诚的，他从不冷眼看待我。至于对我，他似乎就像见到枯树干流出来松脂，太阳被薄薄盖住时现出光圈那样，并未注意。他生活在一个满足的世界里，尽管也不见得常有快乐。我知道他注意到村里的树、村里的泥路、在大街上玩耍的小孩子，我没有理由相信他曾经注意到我。